

胡适致大学毕业生:功不唐捐

这两个星期,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

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自己的经验,赠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做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做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亲居了。

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学非所用,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和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这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抛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力的俘虏。你在那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在社会的顺民了。

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



胡适

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人生的追求。

有什么好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试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往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和理论上的疑难。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两个值得解答的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保持求学问的热心。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知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试想伽利略和牛顿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已。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的和你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往往成了苦工,就感觉不到兴趣了,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

生活的理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

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也应该有他非职业的玩意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成就怎样,往往靠他怎样利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了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的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地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地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地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本文原载1932年7月3日《独立评论》第7号,胡适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本文有删节)

名家之言

张伯苓:

无论各具何长,要皆能发扬光大

1917年10月,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面对毕业生说:“今日正诸生立志之时,无论各具何长,要皆能发扬光大,以备国家千城之选……临别忠言,语短情长,听之择之,是在诸生矣。”

这篇简短的演说,被台下一位年轻人认真抄录下来,名之为“校长训词”,此人正是周恩来。

钱穆:三句俗语赠学生

1957年7月,在香港举行的新亚书院第六届毕业典礼上,书院创办者、第一任院长钱穆的致词引用了三句俗语:一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勉励学生“一天在职位上,就当牢守一天的岗位,尽量把事情干好”;二是“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告诫学生要尽责任,勿推诿;三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因为“人人都把自己门前的雪扫清了,就会打开一条四通八达的大路,对人人都有利益。”

蒋南翔:谦虚谨慎,注意合作

蒋南翔自1952年担任清华校长后就倡导“各按步伐,共同前进”的政策,要求清华人认识到“我们的事业是集体主义的事业,任何工作都要靠同志间的团结与密切合作”。因此,每次留毕业赠言,“谦虚谨慎,注意合作”是他必写的内容。

钱伟长: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2005年7月,上海大学毕业典礼,93岁高龄的钱伟长穿着大红的校长服,颤巍巍地出现了,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学生毕业典礼。钱校长给所有毕业生赠言:“希望你们走上社会以后,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能多想一想我们的祖国现在‘忧’的是什么,中国的老百姓现在‘忧’的是什么;希望你们能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用你们的所学去了解中国之‘忧’,回报祖国,服务人民。”

他山之石

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

做真实的自己

我想,你们之所以会忧心忡忡,是因为你们不想仅仅取得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还想让人生过得有意义,可你们不知道怎么把这两个目标结合起来。你们不确定,是不是在一家大名鼎鼎的名牌企业中拥有一份起薪丰厚、前途光明的工作,就能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关注你的生活,思考怎样才能把它过好,怎样才能把事情做对,这些也许是博雅教育给你最宝贵的东西。通识教育让你自觉地生活,让你在你所做的一切中寻找、定义价值,它也让你成为一个自我的分析家和批评家,让你从最高水平上掌握你生活的展示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博雅教育让你自由,它赋予你行动、发现价值和作出选择的能力。不要静止不动,要随时准备接受改变。牢记那些我们告诉你们的远大理想,就算你觉得它们永远不可能实现,也要记住:它们可以指引你们,让你们到达那个对自己和世界都有意义的彼岸。你们的未来在自己手中。

(演讲时间:2008年5月)

耶鲁大学校长

理查德·查·莱文:重塑政治

也许我对你们未来将会实现的人生价值和取得的事业成就过于乐观了。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假如你同意的观点,那么请允许我提出一个问题,一个深植于耶鲁之精神与传统中以至于你们中的许多人都已经把它看做与生俱来的问题,那就是:你将如何奉献?你将如何把你所在学院中为集体奉献,在纽黑文为这座城市奉献的精神,带到你的生活之中,去改善你身边每一个人的生活?

为什么会这样?请先让我提出我的两点看法,然后让我们看看这与你们未来的政治生涯以及公民身份有什么联系。第一,当今的政治决策过程中往往充斥着为了迎合普通选民肤浅的诉求而刻意简单化的意识形态。第二,美国的政客为了确保再次当选,对手握重金的利益集团过于看重,而对他们的行为到底会给普罗大众带来怎样的利害却漠不关心。

耶鲁大学2010届的毕业生们,你们作为同辈中受过良好教育的未来领袖,肩负着超越意识形态和党派局限的历史责任。你们必须用你们过人的智慧和思辨的精神去提升政治决策的水平。你们必须以公民的身份响应时代的号召。只有通过你们的努力,我们才能保证我们的未来一代能够在“反思与抉择”的基础之上为整个人类文明的福祉服务。你们必然能够完成你们的使命。你们必然能够完成。

(演讲时间:2010年5月)

竺可桢:大学生之责任

诸位来宾、同仁、同学:本届毕业同学行将离母校。离开学校以前诸位是受教育,国家每年要费一二十万金一个人培植你们,离开学校以后,你们就得要为社会服务了。中国大学生较之他国为少,所以你们责任格外重大。如美国每一百人有十六个是大学毕业生,俄国五人,英国二人,我们则不过二分之一。依教育部统计,自民国元年至于卅二年,专科以上毕业生只十二万人,加上民国元年前及卅三四年(除去死亡),最多不会超过十六万人,所以尚不过全人口三分之一。郑康成谓“才德过千人为俊”,则诸君皆今日之俊杰也。

诸君之责任可分为两方面而言之:一方面,诸君学有专长,毕业后各尽其能以贡献于国家,抗战时候如此,抗战以后亦如此。在民廿九年八月九月间英国敦刻尔克撤退大军以后,德国大量轰炸,那时英国守军有训练者只一军之众,飞机不过千架。那时英皇家空军能将德国轰炸机击退,丘吉尔所谓“历史上从来没有以这样少的人做出这样多功绩的”。而英皇家空军能制胜之重要因素即为雷达之发明。发明人乃一物理工程师R.W.瓦特。抗战全赖坦克,飞机与汽车,随处需要橡皮,美国、苏联全部橡皮得自南洋。苏联自1939年至1941年两年之间,美国十八个月,费生物、化学家及工程师之力解决人造橡皮,抗战即能自给。苏联物理学家卡皮查发现低价制氧气法,不但解决飞机上所需的氧,而且煤矿中可以借此不劳掘挖,可以将煤变成气(煤之地下气化)以制造氨(制肥料与炸药)、甲醇(制橡皮)及熔铁炉中之气(还原剂)。不但著名科



竺可桢

学家有所贡献,即一般初出茅庐的理工人才亦大量需要。如英国抗战以前只有三千物理学家,包括中学教师(物理)在内,每年各大学毕业只二百人,而战事如无线电、潜水艇侦察、内燃机等等均需物理人才,故战时大学物理每年毕业生增至一千二百人,至今其中三分之二在军队中工作,三分之一在工厂中工作。以中国幅员之广、人口之众、百姓之穷,战时、建国到处需人。在遵义,我们举目社会上应改进之事正多。譬如这烟把只是一张皮包了一粒骨,每个学园艺果木的人应当自己负责起来把它改良。此外如人民衣着的褴褛,农夫依天吃饭,不讲卫生,以蚤虱之多,识字之少。所谓范文正公当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

此是诸位分内之事,责无旁贷的。

在现代世界你们得认清三点:(一)知先后。抗战如此,建国如此,我们不能不分最要与次要的。小而言之,一个学校、一家公司甚至一个人的做事、读书统要有先后,然后能计划。《大学》里头一章就说“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二)明公私。在抗战时候道德堕落,这是古今中外一律的事。但若能赏罚严明,公私有别,则道德不致十分堕落。中国那么穷,我们就希望大家绞尽脑汁来做发明、办工厂、开农场去发大财,惟有这样国才能富,民才能强。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做官,能发财,但不希望你们做了官再去发财,为做官而发财是没有不贪污的。惟有公私分明而后贪污才能绝迹。(三)辨是非。浙大过去的校训是“求是”。我们应该只知是非,不管利害。此话说来容易,要实行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君子、小人之别只在此一念之别。近世科学之能发扬到如今现状,就是因为先哲布鲁诺、伽利略等不避艰险与中世纪宗教恶势力奋斗成功的。我们学术界事事落人之后而史学尚足有表现,亦是古代的大史能不避斧钺秉笔直书。春秋时候崔子杀掉齐庄公,齐太史就书“崔杼弑其君”。崔子杀太史,其弟继起而被杀者二人,但齐国太史均起而直书,使崔子没有办法。这种不顾是非、不顾利害的精神是每个浙大毕业生应具有的。

(1935年底,竺可桢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1945年,竺可桢在第18届浙大毕业典礼上发表赠言,本文有删节)